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传染病线索和招募信息中主角对献血意愿的影响

作者：龚钰雯；代颖；马祖军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围绕传染病线索和捐赠角色对献血意愿的影响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目前版本仍存在一些问题，除了几个研究彼此之间的内在逻辑需要更加清晰地呈现和阐述外，还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具体如下：

意见 1：文中 1.1 节的章节题目为“传染病线索”，但从引入传染病话题后论述重点一直集中在 BIS，未细节地去阐述 BIS 与传染病线索的关系。请补充说明。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在 1.1 “传染病线索”（详见第 2 页）的论述中，增加了传染病线索的内容，并补充说明了传染病线索和 BIS 的关系，论述了当人们识别传染病线索时，会直接影响个体的 BIS，使得人们从动机、情绪、认知、行为等层面上产生反应以降低感染风险，从而保护个体免受传染病的影响。

意见 2：文中 1.3 节的陈述逻辑混乱，疑有错，请重新整理文字：

(1) “集体威胁”是否代表传染病线索显著的情形？为何此处不将其与前文提到的“新冠疫情”结合叙述？

(2) “受助者信息具体且生动时会提升人们的献血意愿”与后文五项实验中的实验处理毫无关联，写在此处是何用意？

(3) “因此，当传染病线索显著时，受助者主角的招募信息无法提升人们的献血意愿”是从“集体威胁”的论述中作出推断的吗？为何这句话放在与之毫无联系的“受助者信息”后？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以下是我们对三条问题的回复：

(1) 传染病线索是指任何表明传染病可能存在、正在传播或存在潜在风险的信号。集体威胁是指针对一个群体或者整个社会的威胁，这些威胁可能来自外部因素（如自然灾害、传染病、环境污染等），也可能来自内部因素（如社会冲突、政治不稳定等）(Drury et al., 2013; Zheng et al., 2021)。由此可见，传染病线索可以被视为集体威胁的一种形式。因此，集体威胁可以代表传染病线索显著的情形。在之前的版本中，我们认为集体威胁不仅仅只包含“新冠疫情”，所以未将集体威胁和新冠疫情结合起来论述。

(2) 感谢您指出的问题！由于我们之前的论述引起了误会。因此，在修改后的版本中，我们删去了这部分的表述。

(3) 感谢您指出的问题！在之前的版本中，我们是想通过“集体威胁”的论述来推出“当传染病线索显著时，受助者主角的招募信息无法提升人们的献血意愿”。但由于我们逻辑推理欠清晰，导致论述有点乱。因此，我们重新梳理了这部分的逻辑。

根据您提出的上述问题，我们对 1.3 节的内容进行了审查，重新梳理了逻辑。我们首先表述了传染病线索和集体威胁之间的联系，接着指出了人们在面对集体威胁时会表现出的自我保护和利己倾向，然后将这种倾向与受助者主角的招募信息联系起来，推论出受助者主角

的招募信息在传染病线索显著时无法有效提升献血意愿（详见第 3 页，1.3 “传染病线索和慈善捐赠主角”）。

意见 3: 在 2.1 和 5.1 和 6.1 中，描述实验设计类型用的是“组间因子设计”；3.1.1 和 3.2.1 中用的是“被试间设计”；4.1 中用的是“组间设计”。一篇文章内应统一专业术语，请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仔细检查！根据您的建议，我们进行了更正，文章中的专业术语均已统一为“组间设计”。

意见 4: 在 3.1.3 和 3.2.3 处使用 G*Power 3.1.9.7 做后验分析时，括号内的描述是“单因素方差分析”，而其对应的实验 2A 和实验 2B 均为 3×2 被试间设计；在 6.3 处使用 G*Power 3.1.9.7 做后验分析时，括号内的描述为“双因素方差分析”，而其对应的实验 5 为 2×2×2 的多因素被试间设计。这两处疑有错，请修改。

回应: 衷心感谢您的指正，并对错误之处表示歉意！根据您的指出错误，我们进行了对应的修改。

意见 5: 实验 2B 的图 4 中传染性疾疾病侧，捐助者主角招募信息的献血意愿的图形绘制有问题，请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仔细检查！根据您的指出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对应的修改，详见第 13 页。

意见 6: 在 4.3 的实验结果部分，筛选掉 15 份问卷后，收到了 136 份有效问卷，但在用 G*Power 做后验分析时，样本量写作“129”，疑有错，请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仔细检查！我们为在之前的版本中未能清楚解释感到抱歉。由于用 G*power 做后验分析计算样本量时，输入 136 会提示“总体样本（136）不是组数的倍数，分析是基于平均样本量”。因此，我们选择了低于 136 且是组数的倍数的数据进行样本量的 power 值计算。根据您的指正，我们重新使用 G*power 进行了计算，并发现尽管 G*power 给出了提示，但仍然输出了 power 值。因此，我们将总样本更改为原始数据 136，并修改了相应的 power 值（详见第 14 页）。

意见 7: 在 5.3 的实验结果部分，呈现“捐赠主角和自我建构对献血意愿的交互作用”的图 6 在右侧的数据标示处存在问题，请修改。

回应: 在 5.3 的实验结果部分，呈现“捐赠主角和自我建构对献血意愿的交互作用”的图 6 在右侧的数据标示处存在问题，请修改。

意见 8: 在 6.2 的实验流程中，未详细阐述如何通过“代词圈点法”对自我建构进行分组，请补充说明。

回应: 衷心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在 6.2 “实验流程”对自我建构的分组进行了补充说明（详见第 19 页）。

意见 9: 实验 5 是加入了调节变量的中介实验，而在 6.3 中讨论“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时仍使用的是 Hayes 的模型 4（简单中介模型）。是否已经验证过加入调节后的中介效应？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仔细检查！由于使用的是模型 4，我们未能验证加入调节后的中介效应。根据您的指出的问题，我们使用模型 8 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有传染病线索和无传染病线索条件下的样本分别有放回的重复抽样 5000 次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有传染病线索时，捐赠主角和自我建构的交互效应会通过状态焦虑显著地影响献血意愿（调节中介效应 =

0.442, 95%CI [0.032,0.977], 不包括 0)。而在无传染病线索时, 调节中介效应不显著(调节中介效应 = 0.015, 95%CI [-0.036,0.094], 包括 0), 详见第 21 页。

意见 10: 在 6.3“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中“传染病线索作为第一个调节变量(W1: 1 = 有, 0 = 无), 自我建构作为第二个调节变量(W2: 1 = 互依自我, 2 = 独立自我)”提到了两个调节变量, 而按照文中的四个假设和图 1 的研究框架和实验逻辑, 仅有“自我建构”一个调节变量。此段落的数据分析存疑, 请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仔细检查! 根据您的意见, 我们重新进行了数据分析。将捐赠主角作为预测变量(X: 1 = 受助者, 0 = 捐助者), 献血意愿作为结果变量(Y), 状态焦虑作为中介变量(M), 自我建构作为调节变量(W: 1 = 独立自我, 0 = 互依自我), 使用模型 8 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有传染病线索和无传染病线索条件下的样本分别有放回的重复抽样 5000 次。结果显示, 当有传染病线索时, 捐赠主角和自我建构的交互作用影响状态焦虑(路径 a: $b = -0.720, p < 0.001$), 从而影响献血意愿(路径 b: $b = -0.614, p = 0.027$)。对于互依自我倾向的被试来说, “捐赠主角→状态焦虑→献血意愿”的非直接路径效应(间接效应 = $-0.407, 95\%CI [-0.883, -0.028]$, 不包括 0)是显著的, 而对于独立自我倾向的被试来说, “捐赠主角→状态焦虑→献血意愿”的非直接路径效应(间接效应 = $0.035, 95\%CI [-0.017, 0.111]$, 包括 0)是不显著的。详见 6.3 “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详见第 21 页)。

参考文献:

- Drury, J., Novelli, D., & Stott, C. (2013). Psychological disaster myths in the perception and management of mass emergenci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11), 2259-2270.
- Zheng, C., Liu, N., Luo, C., & Wang, L. (2021). Effects of the severity of collective threats on people's donation intention. *Psychology & Marketing, 38*(9), 1426-1439.
-

审稿人 2 意见:

研究的整体设计和施测非常严谨, 也很扎实, 但还有几个问题或者建议想要交流下:

意见 1: 在文献综述部分, 关于实验的几个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前人的研究有不一样的理解, 如 1.2 里认为真实世界里过多的受助者主角宣传已经引发人群的敏感度下降, 1.3 里认为人们在面临集体威胁时(如本文将 covid-19 作为一种威胁背景)将会减少亲社会性, 1.4 里则认为传染病和受助者主角间的关联是引发 BIS 的重要原因, 但在实验材料的设计中, 传染病线索和捐赠主角之间基本没有关联性, 传染病线索更像是一种背景威胁(当然也可以请被试报告下 ta 主观感觉到的关联性), 因此相比起文章认为的焦虑的中介作用, 同样无法排除是否有两种机制共同起作用的可能性;

回应: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 在我们的实验设计中, 传染病线索提供了一种背景威胁, 主要目的是为了被试感知到目前传染病可能存在、正在传播或者潜在风险的信号。同时, 在捐赠主角的实验材料中, 我们告知被试“近期, 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 想要让被试潜意识建立两者之间联系的认知。我们非常认可您的观点, 在实验过程中让被试报告主观感知到的关联性, 能够更加直观地反映被试是否感知到传染病线索和捐赠主角之间的联系。因此, 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补充了一个实验以观察是否有两种机制共同起作用的可能性。实验如下:

在实验设计方面, 启动传染病线索的材料为有关流感传播的简短新闻报道(见附录实验 4 的启动材料)。补充实验采用单因素 2 水平(捐赠主角: 捐助者 vs. 受助者)组间设计。从

Credamo 平台招募了 93 名被试。

实验流程:

实验流程均与实验 3 一致。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被试报告了献血意愿后, 还需要报告传染病线索和捐赠主角之间的感知关联性(您认为近期献血量下降与流感传播存在多大关联? 1=“完全没有关联”, 7=“完全有关联”)。

实验结果:

筛选掉 11 份注意力检测失败的问卷后, 得到 82 份有效问卷(年龄集中在 18-25 岁;女性 43.90%)。采用 G*Power 3.1.9.7 计算样本量的 power 值(Faul et al., 2009)。根据本实验的设计(单因素方差分析, 组数为 2, 效应量为 0.4, 显著水平为 0.05), 样本量为 82 的 power 值为 0.954 (>0.80), 表明有效问卷具有统计检验力。

主效应。当传染病线索显著时, 以献血意愿为因变量, 单因素方差结果显示捐赠主角的主效应显著($F(1,80) = 5.017, p = 0.028, \eta_p^2 = 0.059$)。捐助者主角($M_{捐助者} = 5.405, SD = 0.915$)招募信息的献血意愿显著高于受助者主角($M_{受助者} = 5.008, SD = 0.660$)招募信息的献血意愿。

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为了检验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 采用 bootstrap 方法对总样本有放回的重复抽样 5000 次。使用 Hayes 的中介分析模型(模型 4), 将捐赠主角作为预测变量(X: 1 = 受助者, 0 = 捐助者), 献血意愿作为结果变量(Y), 状态焦虑作为中介变量(M), 如图 1 所示。结果显示, 受助者主角(vs.捐助者主角)招募信息导致状态焦虑的水平较高(路径 a: $b = 0.518, p < 0.001$), 从而降低了献血意愿(路径 b: $b = -1.074, p = 0.004$)。重要的是, “捐赠主角→状态焦虑→献血意愿”的非直接路径(间接效应 = $-0.556, 95\%CI [-0.918, -0.253]$, 不包括 0)在传染病线索显著的情况下是显著的。

控制因素和替代性解释。对于献血经历和亲友是否接受过其他人的血液作为控制因素, 2 组被试无显著差异(献血经历: $F(1,80) = 0.09, p = 0.770$; 接受过其他人的血液: $F(1,80) = 0.13, p = 0.719$)。2 组被试的同理心($F(1,80) = 0.19, p = 0.663$)、感知威胁($F(1,80) = 0.42, p = 0.518$)、医学恐惧($F(1,80) = 0.03, p = 0.858$)、感知关联性($F(1,80) = 2.68, p = 0.106$)以及基于其他状态的情绪(厌恶($F(1,80) = 0.73, p = 0.395$)和恐惧($F(1,80) = 0.127, p = 0.263$))均无显著差异。虽然状态焦虑与感知威胁($r = 0.403, p < 0.001$)、感知关联性($r = 0.267, p = 0.015$)之间存在相关性, 但是这两个变量无法替代状态焦虑作为中介变量(感知威胁: 间接效应 = $-0.034, 95\%CI [-0.122, 0.028]$; 感知关联性: 间接效应 = $-0.141, 95\%CI [-0.329, 0.026]$; 均包括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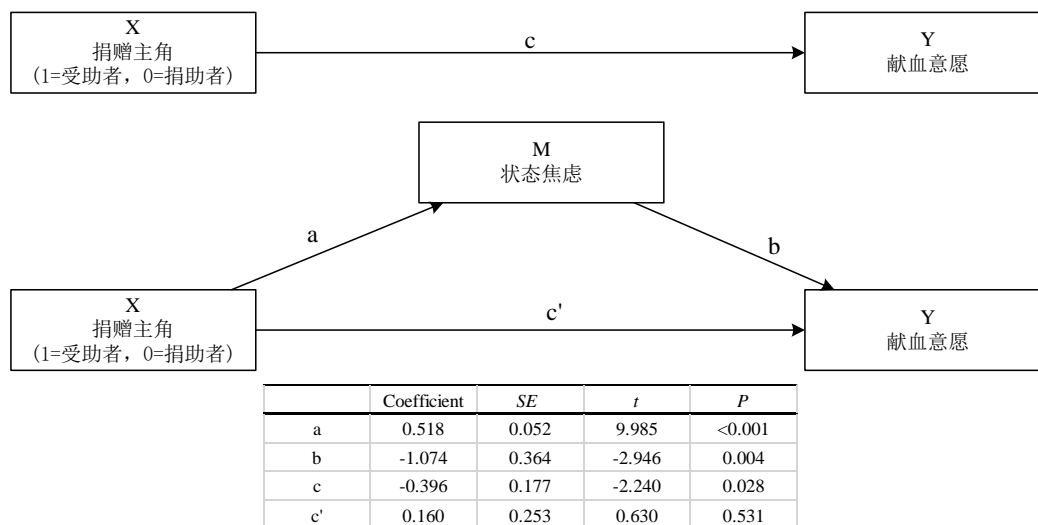


图 1 Bootstrapping 中介分析(补充实验)

通过上述补充实验的分析，我们排除了感知关联性等变量的替代性解释。

意见 2: 在文献综述 1.4 中提到 BIS 会增大疾病威胁、感知威胁，继而引发焦虑，但在实验 3 和 5 中作为控制变量的同理心、感知威胁和医学恐惧并没有显著差异，可能需要进一步解释一下；

回应: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一方面参照 Ran et al. (2021) 的研究，分析了控制变量和状态焦虑的相关性，并检验具有相关性的变量的中介作用。在实验 3 中，结果显示状态焦虑与感知威胁之间存在相关性 ($r = 0.279, p = 0.007$)，但是感知威胁无法替代状态焦虑作为中介变量（间接效应 = -0.06 , 95%CI $[-0.026, 0.329]$ ，包括 0），详见第 15 页。在实验 5 中，结果显示状态焦虑与感知威胁之间存在相关性 ($r = 0.115, p = 0.029$)，但是感知威胁无法替代状态焦虑作为中介变量（有传染病线索：调节中介效应 = -0.006 , 95%CI $[-0.062, 0.028]$ ；无传染病线索：调节中介效应 = -0.008 , 95%CI $[-0.073, 0.032]$ ；均包括 0），详见第 22 页。另一方面，我们在实验 3（详见第 15 页）和实验 5（详见第 22 页）的实验讨论中进一步作了解释。

意见 3: 整个文献综述的逻辑推理可以进一步再梳理一下，如 1.3L8 的“因此……”，这个推论并不是十分有力；

回应: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对文献综述进行了梳理，并着重对 1.3 节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我们首先阐述了传染病线索和集体威胁之间的联系，接着指出人们在面对集体威胁时会表现出自我保护和利己倾向，然后将这种倾向与受助者主角的招募信息联系起来，推论出受助者主角的招募信息在传染病线索显著时无法有效提升献血意愿（详见第 3 页，1.3 “传染病线索和慈善捐赠主角”）。

意见 4: 最后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既然提及了自我建构的互依性以及 1.3 中提及了心理距离，未来也可以增加捐赠主角是被试熟悉的人的实验，以进一步厘清作用机制。

回应: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对未来研究的建议！我们已将其纳入未来研究展望（详见第 24 页，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参考文献：

Faul, F., Erdfelder, E., Buchner, A., & Lang, A. G. (2009).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es using g*power 3.1: Tests for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es. *Behav Res Methods*, 41(4), 1149-1160.

Ran, Y., Niu, Y., & Chen, S. (2021). “More” is less: Why multiple payment mechanism impairs individual dona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3(04), 413-430.

[冉雅璇, 牛熠欣, 陈斯允. “多”反而少：元认知推断视角下支付渠道数量对个体捐赠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21, 53(4): 413-430.]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对前一轮所提的意见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仍未有效地对全文进行深刻和细致的核查与修改，当前版本中仍存在相当的有待增进的内容或者谬识，列举如下：

回应: 非常感谢您再次审阅我们的论文，并提出宝贵的意见！根据您这一轮的意见，我们继

续对论文进行了深入修改。修改后版本的逻辑性、准确性有显著提高，希望您能够满意我们的修改。

意见 1: 文献综述 1.1 传染病线索中“因此，当人们识别传染病线索……引发回避风险以降低感染风险。”这一句建议放在段末，作为上述所有论据的结论，使得上下连贯的逻辑更清晰。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将这一论点放在段末作为总结性陈述，确实可以加强论据之间的逻辑连贯性，使得整个段落的结构更为清晰和有力。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将“因此，当人们识别传染病线索时，会引发负面情绪并进行认知加工，从而引发回避反应以降低感染风险。”放在了段末，详见第 2 页。

意见 2: 本文 6 项实验研究中，实验 1 和实验 4 是通过“询问被试是否愿意成为献血者，愿意者留下联系方式并协助被试预约就近的献血中心”来测量献血意愿，其余实验则是使用量表来测量献血意愿。根据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是影响个体行为意愿的关键因素，而行为意愿和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决定实际行为。故可知，从行为意愿（intention）到实际行为（behavior）还有一段距离，取决于不同因素的强度。实验 1 和实验 4 的献血意愿的测量方式是否存在一种直接测量了实际献血行为而未能反映真实的献血意愿的可能性呢？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我们在设计 DV 时，考虑到虽然量表是评估献血意愿的有效工具，但其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量表在测量献血意愿时依赖于被试的自我报告，这可能会受到社会期望偏差的影响。被试可能倾向于报告他们认为社会所期待的意愿，无法精确地捕捉到被试的真实行为意愿(Nederhof, 1985)。因此，为了更全面地评估献血意愿，并尽量减少单一方法可能带来的偏差和局限性，我们想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测量献血意愿。“询问被试是否愿意成为献血者，愿意者留下联系方式并协助被试预约就近的献血中心”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被试内在的意愿和态度，而不是直接观察献血行为本身。通过询问个体是否愿意献血是对个体献血意愿的直接评估，而且通过留下联系方式并进行献血预约，能进一步验证献血意愿的实际强度，从而超越了口头上简单的承诺。这个步骤不仅能够作为对意愿的一个实质性验证，也有助于减少由社会期望偏差带来的影响。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行为意愿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行为意愿和感知行为控制共同影响了个体行为(Ajzen, 1991)。然而，以往有关计划行为理论在无偿献血领域的应用的研究表明，计划行为理论在解释和预测从献血意愿到献血行为的转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除了原有影响因素外，还涉及到了情感因素、道德规范、社会身份、外部环境因素等方面的影响(Ferguson et al., 2007; Masser et al., 2008; Masser et al., 2009)。因此，即使被试表达了献血意愿并被协助预约了献血，但最终是否去献血可能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影响，比如家人支持、情境变化、个人情况变动或其他未预见因素等。此外，献血行为的实验与其他类型的慈善捐助行为的实验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在典型的慈善捐助实验中，被试的捐助行为（比如捐赠金钱）是即时且可验证的。这意味着研究者可以直接观察到捐助行为的发生，并且可以精确测量捐助的金额大小(Choi & Park, 2021; Ran et al., 2021; Zheng et al., 2024)。因此，被试的捐助决策直接影响他们的实验补偿，使得捐助行为的后果十分明确。然而，无偿献血的情况则复杂得多。虽然个体可能表达了愿意献血的意向，并留下了联系方式也进行了预约，但这并不保证他们最终会实际献血，还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具体的献血过程还涉及到更多的后续步骤，如献血便利性、健康检查等。因此，即使有人表示了献血意愿，实际上完成献血的行为还需要跨越多个障碍。由于这种方法仍然存在从意愿到实际行为转化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认为这并不等同于直接测量了实际的献血行为，而是对献血意愿的一种更实际的测量。

另外,根据您在意见 6 的建议,我们修改了实验 4 的内容并将其标题更改为“实验 4A”。在这一部分中,我们通过测量被试的特质性自我建构来检验了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同时进一步验证了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详见第 16-19 页),该部分通过量表测量了献血意愿。论文中其他提及实验 4 的内容也进行了相应的修改(详见第 5 页的“1.6 当前研究”;第 30 页“英文摘要”)。

意见 3: 实验 2A 中自变量“威胁类型”有“传染病和事故组”两个水平,实验 2B 中将“传染病”进行了细分为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但仍使用的“威胁类型”作为自变量名称。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此处建议可在实验 2B 的“威胁类型”前加上“疾病”二字,即“疾病威胁类型”。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已经将实验 2B 中的自变量名称从“威胁类型”修改为“疾病威胁类型”,详见第 11-13 页。

意见 4: 实验 3“控制因素和替代性解释”中的修改部分建议补充文献综述 1.1 节中论述的内容(在有传染病线索时,BIS 对认知和情绪两方面的影响),合理化替代性解释的必要性。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根据之前实验 3 修改部分的内容,我们明确了同理心和医学恐惧主要关联情绪层面,而感知威胁则更多涉及认知层面,根据这些概念所属的不同层面在“1.1 传染病线索”处进行了表述(详见第 2 页)。此外,我们在实验 3“控制因素和替代性解释”部分补充了“在有传染病线索时,BIS 的激活显著影响了个体的情绪和认知”的相关论述(详见第 15 页)。

意见 5: 实验 3 的实验讨论的修改部分,“尽管传染病线索让人们感知到威胁,但受助者主角的招募信息引发了消极联想”这一句的关联词逻辑疑有误,建议修改。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已对这句话进行了修改,详见第 16 页。

意见 6: 依据文献综述 1.5 中的论述,“自我建构类型”似乎是一种长期的人格类型。实验 4 是通过测量长期性自我建构来分组,实验 5 中则是通过一种代词圈点法的方式来操纵短期性自我建构。建议在文献综述 1.5 中补充说明两种不同类型的自我建构,同时也需要验证长期性自我建构的调节下是否也存在焦虑情绪的中介作用。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已在“1.5 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详见第 4 页)补充说明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自我建构(特质性自我建构和情境性自我建构)。在此基础上,调整了论文结构,将上一版中的第 5、6 节内容整合在一起为第 5 节“实验 4: 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并将其分为三个部分“5.1 实验 4A”、“5.2 实验 4B”和“5.3 实验讨论”。“5.1 实验 4A”通过测量被试的特质性自我建构检验了自我建构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状态焦虑的中介作用(详见第 16-19 页)，“5.2 实验 4B”为原第 6 节内容未做改动,“5.3 实验讨论”根据 5.1 和 5.2 的结果进行了讨论(详见第 24 页)。

参考文献:

- Ajzen, I. (1991).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50(2), 179-211.
- Choi, J., & Park, H. Y. (2021). How donor's regulatory focus changes the effectiveness of a sadness-evoking charity appe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38(3), 749-769.
- Ferguson, E., France, C. R., Abraham, C., Ditto, B., & Sheeran, P. (2007). Improving blood donor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advances from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research agendas. *Transfusion*, 47(11), 1999-2010.
- Masser, B. M., White, K. M., Hyde, M. K., & Terry, D. J. (2008). The psychology of blood donation: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directions. *Transfusion Medicine Reviews*, 22(3), 215-233.
- Masser, B. M., White, K. M., Hyde, M. K., Terry, D. J., & Robinson, N. G. (2009). Predicting blood donation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among australian blood donors: Testing an extend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model. *Transfusion*, 49(2), 320-329.

Nederhof, A. J. (1985). Methods of coping with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A review.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5(3), 263-280.

Ran, Y., Niu, Y., & Chen, S. (2021). "More" is less: Why multiple payment mechanism impairs individual dona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3(04), 413-430.

[冉雅璇,牛熠欣,陈斯允. "多"反而少:元认知推断视角下支付渠道数量对个体捐赠的影响[J]. 心理学报, 2021, 53(4): 413-430.]

Zheng, X., Han, R., Ruhan, L., & Xu, J. (2024).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processing fluency and information credibility on donation in the digital philanthropy context.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6(2), 226-238.

[郑晓莹,韩润蕾,刘汝晗,等.信息加工流畅性与真实性对互联网公益捐助的影响[J].心理学报,2024,56(02):226-246.]

.....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对审稿意见作出了合理的解释和答复,没有其他问题了。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本研究提供的指导和帮助!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作者针对前一次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无新的意见了。

编委意见:同意审稿专家意见,建议发表。

主编意见:同意发表。但建议作者考虑修改文章标题中的“捐赠主角”和摘要及正文中的“受助者主角(捐助者主角)的招募信息”。“以捐助者(受助者)为主角的招募信息”或“捐助者(受助者)为主角的招募信息”更为准确,比简化后的“受助者主角(捐助者主角)的招募信息”要更清楚。“捐赠主角”是否可考虑改为“招募信息中主角”或“招募宣传中主角”或其他更准确的表达?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已将“捐赠主角”修改为“招募信息中主角”,摘要中及正文中“受助者主角(捐助者主角)的招募信息”修改为“以捐助者(受助者)为主角的招募信息”。